

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化转向及其意义

任 然¹, 桂起权²

(1. Finders University College of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Law, South Australia 5042;

2.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近三十年来经济学中最令人瞩目的进展是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转向。这一转向源自穆勒,其中豪斯曼和卡特赖特是其坚定倡导者。豪斯曼认为经济学定律是不精确的趋势律,他把或然性、近似性、可精炼和可宽容作为刻画定律的标准,开启了其所说的“经验转向”。卡特赖特提倡自然主义的“实践”进路,主张科学知识是局域化的,“权能”或因果力是定律背后更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转向引起了科学方法论和哲学的一系列变革。

[关键词]穆勒;豪斯曼;卡特赖特;经济学方法论;自然化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5-0024-06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5.003

The Turn of Economics Methodology to Naturaliz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REN Ran¹, GUI Qi-quan²

(1. College of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Law, Finders University, South Australia 5042, Australi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remarkable development in economics in the last 30 years has been the methodological turn to naturalization which originates from Muller firmly advocated by Hausman and Cartwright. Hausman considered the economics law to be an imprecise trend law, and he started what he called the "empirical turn" by taking the probability, approximation, refinement and tolerance as the criteria for describing the law. Cartwright advocated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naturalism, arguing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was localized and "power and function" or causal force was the more basic element behind the law. The turn of economics methodology to natural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changes in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Muller; Hausman; Cartwright; economics methodology; naturalization

近三十年来,科学哲学经历了从基础主义科学的哲学,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向,这就是所谓向自然主义的转向,经济学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科学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转向。在这个转向

收稿日期:2020-07-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18)

作者简介:任 然(1984—),女,四川泸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桂起权(1940—),男,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中,穆勒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嬗变十分引人注目。正像科学哲学的发展正越来越远离极端的科学主义观点而转向自然主义一样,经济学方法论也越来越转向以实践优位的自然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不仅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ins),而且包括丹尼尔·豪斯曼(Daniel Hausman)和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的自然主义认识论。限于篇幅,本文将探讨穆勒、豪斯曼和卡特赖特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自然主义观点,特别是对经济学实践的强调和对经验的重视等方面。

一、穆勒:经济学方法论自然化的先驱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著作《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在近代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广泛流传。该书的副标题是“证据的原理与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叙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该书不仅包含狭义的演绎逻辑,而且包含归纳逻辑和当时已经得到发展的社会科学哲学,特别是经济学哲学。穆勒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这些原理进行阐释,而是试图去证明其合理性。一方面,他反驳了洛克(Locke)、里德(Reid)等早期经验主义学家对逻辑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批评唯理论者夸大逻辑在经验研究方法中的作用,他也批评那些他所称的直觉主义者,包括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等人的观点。

实际上,穆勒对形式逻辑的探讨是与经验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紧密相联的,也与推理作为证据的验证在寻求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观点密切相关。对穆勒而言,后一个目标意味着任何完整的逻辑体系的阐述都不仅应该包含着大量正确的推理,也应包括大量的不

正确推理。因此,逻辑谬误的研究在任何逻辑体系中都应具有重要地位。

穆勒的《逻辑体系》分为六个部分,前五个部分都是在作逻辑理论阐述,第六部分“道德科学的逻辑”,实际上是关于逻辑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中的应用。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

总之,穆勒在《逻辑体系》中所做的工作是对逻辑的综合处理,既考虑先验因素又考虑经验因素,这在标准的逻辑著作中是很少看到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穆勒成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主义转向的先驱。一方面,穆勒在科学方法论上重视经验,提出了科学探究的“穆勒方法”;另一方面,他还是经济学家中演绎主义方法论的早期代表和核心人物。换言之,穆勒虽然重视演绎法(主要是三段论),但在他看来,归纳法比演绎法更基本。注意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穆勒为什么会声称“经济学是一门演绎科学”,同时又认为演绎法有赖于归纳法。这是穆勒对逻辑上的“归纳与演绎”关系的经典表述。实际上,在穆勒那里,基于先验研究的演绎法与基于经验研究的实验方法是不可截然二分的。这就与后来蒯因(Quine)主张模糊经验研究与先验研究截然二分界限的思想前后呼应^[1],也为经济学方法论从基础主义转向自然主义铺平了道路。为什么经济学中只能运用演绎法?穆勒提出了两条理由^{[2](P21)}。

第一,经验主义的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行不通,所以它只能运用先验主义的演绎法。但先验主义的演绎法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实验方法或归纳方法之上。

第二,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假设前提(即公理)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公理有同等功效。经济学家是以这些行为作为假定前提演绎出各种结论的。本文认为,尽管穆勒声称“经济学是基于先验演绎方法的”^{[2](P23)},但从认识

论角度看,穆勒演绎/先验的经济学方法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归纳/经验基础之上的。

总之,穆勒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主张经济学是关于趋势律的演绎科学。也就是说,在穆勒看来,经济学规律是一种弱规律,与物理学的强规律不一样。这种趋势律虽然是无例外的,但它是不精确的。由于穆勒的经济学方法论具有归纳/演绎、先验/后验的两重性,这就导致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指责穆勒在搞“折中”“综合”。然而,正是穆勒认识论思想中的重视经验和实践的观点,尤其是穆勒关于经济学规律是不精确趋势律的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方法的自然主义转向开辟了道路。

二、豪斯曼:开启经济学方法论的经验转向

丹尼尔·豪斯曼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主要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学解释为一门不精确的独立科学,还写就了一本关于资本案例研究的专著。

丹尼尔·豪斯曼站在穆勒方法论的立场上批评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拉卡托斯(Lakatos)的方法论,认为它们在经济学中都不适用,最适用的方法是穆勒提供的。豪斯曼一方面对穆勒经济学方法论中强调先验的演绎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他赞赏穆勒经济学研究的经验主义倾向以及对经济学实践的充分重视。实际上,豪斯曼在重新阐释穆勒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立场时,已经暗暗开启了转向自然主义的大门。

在豪斯曼看来,这种自然化转向可以称之为“经验科学哲学”或“科学哲学的经验进路”。显然,这里的“经验转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化转向”。

豪斯曼从“自然主义科学哲学”的视角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际活动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自己的经验转向。我们知

道,穆勒虽然对经济学定律做了弱化处理,但他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学中的先验/演绎与经验/归纳之间的可相容性,而豪斯曼更多地强调经济学定律只能是“趋势律”,因而是精确的。尽管经济规律的不精确性是穆勒首先指出的,但豪斯曼对它为什么不精确的进一步分析是促成方法论经验转向的重要因素。正如豪斯曼在《作为不精确和独立的科学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学领域中因果因素占优势,其“定律”的合理性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应用这些定律的经济理论只能提供一个不精确的说明^{[3](P90-91)}。

在豪斯曼看来,经济规律中所谓趋势只是一种潜能,是一种因果力量。这就在走向自然主义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3](P127)}。接下来,豪斯曼为不精确定律设置了四条标准:第一,它是“近似真的”,这是“近似”标准;第二,它是“概率的”,这是或然性标准;第三,它所作的是“虚拟的推断”,这是可精炼标准;第四,它假设“其他条件相同”,这是可宽容标准。所以,豪斯曼说:“在我看来,只要一个概括是似律的、可靠的、可精炼的和可宽容的,如果没有它的限制条件,即使它将面对反驳,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条定律。”^{[3](P141)}

总之,按照豪斯曼的观点,经济学定律是不精确的,这种弱化的定律体现的只是一种潜能、一种因果力量。这就把穆勒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延展到方法论,并在实践中应用于经济学,为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转向开启了一扇大门。

三、卡特赖特:推进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转向

南希·卡特赖特是伦敦经济政治科学学院、英国科学院院士。她著有《物理学定律如何说谎》(*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 1983)、《自然的权能及其测量》(*Nature's Capacities*

and Their Measurement, 1989)、《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The Dappled World—A Study of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1999)。从其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她对自然定律比较关注,试图推进一种自然主义的“实践进路”。

卡特赖特认为,实体拥有“权能”(capacities),是处在定律背后的更为基本的要素。在她看来,就像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局域化的一样,经济学知识也是局域化的^[4]。简言之,卡特赖特的自然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之一是强调定律背后不过是一种“权能”,经济学知识只能是局域化的。这就进一步深化了经济学方法论中自然主义的实践进路。

卡特赖特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深受斯坦福学派科学哲学家的影响;二是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物理学与经济学中的建模与测量”研究小组的影响。项目的模型方面,主要受到玛丽·摩根(Mary Morgan)和玛格丽特·莫里森(Margaret Morrison)等人的影响^{[5](P4)}。不难看出,卡特赖特的哲学研究是以物理学和经济学为范例的。

在物理学领域,卡特赖特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野考察了牛顿第二定律。她指出,按照基础主义的观点,人们通常把“ $F=ma$ ”理解为如下全称量化命题,即“在任何情形中的任一物体,它的加速度将等于它在此情况中受到的力除以它的惯性质量”。然而,卡特赖特认为,只有在其他情况相同的前提下,这个全称命题才能成立。在科学实践中,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她认为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对于任何情形中的任一物体,如果没有东西干扰,那么它的加速度将等于它在此情况中受到的力除以它的惯性质量。”^{[5](P28-29)}为此,卡特赖特指出:“定律可以为真,但不是普遍的。”^{[5](P44)}她还主张:“我反对无条件的、在范围上不受限制的定律。”^{[5](P69)}实际上,卡特赖特从物理学实践中得到的启示是:科

学定律不是普遍适用、无限制和无条件的,这就打破了科学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从基础主义的立场转到了自然主义的立场,开辟了自然主义的“实践”进路。实际上,在经济学领域,卡特赖特作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化转向的重要人物之一,特别强调科学的哲学争论的最终裁决是实际的科学实践,主张关注真实的科学实验和活生生的科学理论。

卡特赖特着重从一般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因果性机制。首先,她以计量经济学这个特例来研究这种因果力(权能)。该特例用以下需求方程表达:

$q = \alpha p + \mu$ (需求量 = 参数 · 价格 + 概率性波动)

不难看出,这一方程中的参数是“衡量价格权能产生(或抑制)需求的力量”^[6]。

从一般科学方法论角度看,卡特赖特关于权能、因果性潜力的观点与穆勒是一致的,但她明确地把经济学趋势律中的趋势看作是一种权能,这就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转向。

总之,卡特赖特的“实践的经验论”(更恰当的说法是自然主义)比其他科学哲学更为基本地依赖于经济学。实际上,卡特赖特不仅在一般科学方法论中强调实践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把这一观念彻底贯彻到具体科学,即经济科学中,强调实践在经济生活中的最终裁决权,提倡科学解释的模型理论,主张科学知识是局域化的,“权能”或因果力是在定律背后更为基本的要素,从而真正实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化转向。

四、经济学方法论自然化的特质及其意义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自然化转向源于穆勒,在豪斯曼那里得以深化,在卡特赖特那里得到比较全面的推进。这一转向,一方面是由于经

济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驱动,另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外在发展推动。实际上,自然化所强调的是自然现象和人类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它不能“还原”到别的东西上。这里涉及到一般科学方法论的自然化与具体科学方法论的自然化。一般科学方法论的自然化主要涉及四个问题:(1)是不是只需要描述而不需要规范的问题;(2)是对自然定律或者原因应该作经验论的解读,还是唯理论的解读的问题;(3)是否需要倒转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等级层次问题;(4)是否存在循环论证问题,即是否可以像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所说那样在船上修船,如此等等。

除了探讨上述问题之外,经济学主要通过探讨一些较为特殊的论题来展示方法论自然化的特质,这些论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趋势律”论题。所谓趋势律不同于物理学中的定律,由于无法消除的干扰,它只是一种弱化的规律。穆勒认为趋势律表现出关于因果关系的倾向;豪斯曼认为经济规律是不精确的趋势律,而且所谓趋势只是一种潜能,是一种因果力量;卡特赖特主张权能实在论,认为实体拥有“权能”,它是处在定律背后更为基本的要素,可以看作构造世界的基石。

二是描述性与规范性论题。多数哲学家虽然不愿意完全取消规范而代之以描述,这样做等于专业的集体自杀。虽然新的方法论不会像传统方法论那样严格规范化,但他们还想保留一些规范性要求。穆勒的经济学方法基本上是规范化的,但他同时承认,规范化方法只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这种基础却不是规范化的。豪斯曼认为,经济学的趋势律是不精确的,而刻画这种不精确定律的主要是概率、统计的方法,且这种定律符合含糊的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款,这些条款显然不是规范化的,而是描述性的。卡特赖特认为在科学实践中对因果机制的

描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穆勒那里还有不少规范性要求的话,那么在卡特赖特那里,描述性要求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当然她并不否认规范性的作用。

三是演绎法与归纳法论题。这个论题归根结底是先验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问题。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化转向,先验主义成分相对减少,经验主义成分日渐凸显。经济学定律的不精确性要求科学研究必须考虑概率和统计方法,因而在运用演绎法的同时需要归纳方法和不确定推理。穆勒虽然认为经济学中的方法只能是演绎法,但他也认识到从普遍规律出发的演绎法,其大前提还必须依靠归纳法。虽然豪斯曼和穆勒一样坚持经济学中需要演绎法,但他在为“不精确的”定律的合理性作出辩护时也探讨了或然性问题,软化了穆勒在经济学中的演绎主义立场。卡特赖特在考虑以“权能”构成“律则机制”再构成“定律”的思路以重建科学知识体系时,从她描述因果机制的方式看,至少不是坚定的演绎主义者。

四是实践或经验论题。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化要求我们关注真实的科学实验和活生生的科学理论。显而易见,穆勒的经济学方法已经考虑到在经济学中的可应用性。豪斯曼指出,经济学方法论的经验转向就是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化。卡特赖特所说的转向主要是指经济学从理论优位到实践优位的转化。

总的来说,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化转向对哲学和经济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推动了经验主义的复兴。与传统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经验主义的新建构在方法论上反对还原主义,主张整体论,在知识论上坚持认为获得知识的方式就是经验的方式^[7]。他们强调描述性甚于强调规范性,反对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式第一哲学,这就为经验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二是推动科学哲学从理论优位向实践优位的转向。自然化的经济学方法论更加关注实践中的科学,即科学知识的具体生产过程^[8]。这种方法论不再把科学理解为知识,而是理解为实践。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实践过程中的交往活动,才能获取知识,组织社会生活,进而将科学实践置于更广阔的实践概念中,推动科学实践哲学的兴起。

三是推动经济模型方法和经济学修辞学的发展。受经济学方法论自然化转向的影响,当今的经济学模型方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9]。在玛丽·摩根看来,科学模型不应该仅仅是实证主义的形式分析模型。经济学中的模型比较复杂,必须通过考察经济学家实际的建模实践来研究。而不仅仅是看模型在物理学或数理逻辑中的作用,或坐在扶手椅上作哲学沉思。经济模型需要讲述故事。模型不是被动的,为表现其动力学特质必须对它们提问,而模型的动力学总是包含故事^{[2](P351-352)}。即使是供给和需求模型,或索洛增长模型,也有相关的故事。摩根认为,模型方法与隐喻方法有关联,模型化方法的发展无疑会推动经济学中隐喻理论的兴起。总之,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化将有助于经济模型方法与经济学修辞学的结合,进而

开拓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 [1] 文贵全,朱葆伟.蒯因对卡尔纳普“第一哲学”的批判——自然主义哲学在当代兴盛的前奏[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34-39.
- [2] Wade Hands D.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Hausman D. 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4] 吴志远.南希·卡特赖特的科学哲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
- [5] [英]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的边界的研究[M].王巍,王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6] Cartwright N. A Case Study in Realism: Why Econometrics Is Committed to Capacities [C]. East Lansing, MI: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89: 195.
- [7] Michael Esfeld. “Cartwright on wholism” in Stepham Hartmann [A] // Carl Hoefer and luc Bovens, eds. Nancy Cartwright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324.
- [8] [美]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版前言”(IV).
- [9] 陈群,徐华.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实在论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5-43.